

论当代汉语四阶连续体*

刘俐李 唐志强

提要 当代汉语普通话与方言共存,形成四阶连续体。普通话与方言分布在连续体两端,地方普通话与趋普方言居中,为连续体两端的过渡样态。实证分析过渡样态的语音变异表明,在普通话与方言的高频接触中,经异源性变异与自源性变异,以普通话为目标语的地方普通话生成;经蚕食性变异与虹吸式变异,以普通话为定向标的趋普方言形成。

关键词 汉语四阶连续体 地方普通话 趋普方言 语音变异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汉民族的通语与方言相互依存、和而不同地共存于历代社会。观察汉语的现状也会发现,汉语共同语(普通话)与方言也是和而不同地并存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共同语/通语与方言是一种语言的两种样态,二者的并存状态及相互关系,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各历史时期通语与方言共存的样态很难细查,但当下的情状应有答案。而在众多普通话与方言的研究文献中,鲜见二者共存样态的阐述。依据方言与普通话研究的已有积累,本文尝试浅析。

1. “和而不同”的当代汉语四阶连续体

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及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国情加速了汉语共同语与方言相互渗透的步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态。在共同语与方言之间有两种中间样态: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即带有方言特点的共同语;不那么正宗的方言——趋普方言,即带有普通话元素的异化方言。共同语、方言与其间的两种变体是当代汉语“和而不同”的四种样态。这四种样态形成一个连续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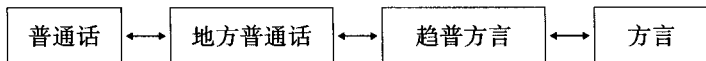


图 1 当代汉语四阶连续体

普通话和方言在这一连续体的两端,各有自成系统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结构及特征。地方普通话和趋普方言是共同语与方言之间的过渡样态,分别衔接两端的普通话和方言,四者“和而不同”但彼此相连,形成一个连续体。从语言系属和语言系统的纯度看,地方普通话是普通话的下阶,趋普方言是方言的下阶。地方普通话是普通话的共时变体,趋普方言是方言的微历

*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方言自然口语有声基础语料库建设”(12&ZD177)的资助。本文曾在“‘动态普通话:变异与规范’首届学术研讨会”(2014.12.1,澳门大学)宣读,本次发表有较多修改与补充,包括标题。感谢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人中肯的修改意见。文中若有不妥系作者之责。

时演化。从语言发展的大势主流看,其方向应是:方言→趋普方言→地方普通话→普通话。故此,本文用“四阶连续体”指称这四种语言系属相关、演化路径互衔的当代汉语连续体。

普通话(共同语)和方言是人们熟知的语言学基本概念,毋庸多言,而地方普通话和趋普方言需要解释。地方普通话是以普通话为目标语的中介语,其音系以普通话的标准音北京音为主体,但带有方言成分,词汇与语法也如此。地方普通话可借用普通话水平等级来衡量与框定。普通话水平分三级六等,一级甲等为标准普通话,一级乙等为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二级、三级则带有程度不同的方言成分,当为地方普通话。在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标准中有方音成分的明指,例如试卷第五题“命题说话”的语音评分标准设六档,除第一档“语音标准,或极少有失误”不含“方音”外,第二至六档均含“方音”：“有方音但不明显”(二档)、“方音比较明显”(三、四档)、“方音明显”(五档)、“方音重”(六档)^①。这些条陈支持本节所论。本文“普通话”多指一级,不含二、三级的“地方普通话”。

趋普方言是因普通话影响而诱发自身系统演化的新方言,其语言系统中加有非自源性异质成分。其音系以原方言音系为基础,突出的标记性特征被削弱或消解;大量吸收普通话词汇,标记性的方言特征词快速萎缩。趋普方言多为各方言中的新派。近30年出版的各种方言著作大都记录了方言的新老派之异。例如记录42种方言词汇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李荣主编),有29种记有方言的新老派差异,并认为新派方言的特点多因普通话影响所致^②。如西安“猪、出”等字老派读[pfu²¹][pf^hu²¹],新派为[tʂu²¹][tʂ^hu²¹];贵阳老派没有撮口呼韵母,新派有。西安、贵阳老派的这些标记性声韵特征新派均已磨蚀。再如太原、南昌的人声,老派为阴阳两分,而新派合二为一;宁波老派7个声调,新派6个;上海老派6个声调,新派5个。新派方言声调简化的诱因是否源自普通话虽需论证,但与老派比,其简化趋势与4个声调的普通话更接近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流通域看,当代汉语四阶体的域宽不同,从宽到窄成梯度分布:

普通话 > 地方普通话 > 趋普方言 > 方言

普通话通行于当代汉语社会整体,包括人际交际,人与介质、介质与介质的交际;而地方普通话只通行于当地社会,趋普方言与方言则通行于该方言的所在地,四种阶体的流通域域宽依次递减。

从使用人数看,四阶体两端小中间大:普通话<地方普通话,趋普方言>方言。

两端的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人数要少于中间的地方普通话和趋普方言。这是大中城市的情况,小城市及农村详后。

普通话的使用人数少于地方普通话可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数据来证实。普通话只含一级,而地方普通话含二、三两级。凡测试,其成绩的正态分布总是两头小中间大,因此,无论数理还是数据都可证明,一级普通话的人数要远少于二级、三级之和。下表1是三所高校2014、2015年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数据。三高校均无一级甲等,表中“一乙”指一级乙等,“二、三级”均含甲、乙两等。表中“地普”是地方普通话的缩称。

① 《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② 广州、福州、黎川、东莞、丹阳、上海、苏州、宁波、杭州、温州、金华、长沙、南昌、萍乡、柳州、徐州、扬州、南京、武汉、成都、贵阳、哈尔滨、济南、牟平、万荣、太原、西安、乌鲁木齐、银川等方言词典,均有方言新老派差异的阐述。

表 1 三高校普通话水平测试数据^③

	2014 年				2015 年			
	一乙(普通话)		二、三级(地普)		一乙(普通话)		二、三级(地普)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高校 1	20	0.64%	3117	99.36%	38	1.15%	3263	98.85%
高校 2	5	0.05%	9442	99.95%	4	0.06%	6709	99.94%
高校 3	143	4.2%	3259	95.8%	200	5.94%	3165	94.06%

表 1 显示,一级乙等的普通话人数的最大数据是 2015 年的 5.94%,而二、三级地普的最小数据是该年的 94.06%,差距悬殊。高校的普通话水平通常高于普通社会人群(不含播音主持界,但其人数远少于高校)。由此可知,“普通话的使用人数少于地方普通话”符合实际。大中城市如此,小城镇及农村也当如此,因为后者的普通话普及水平远不及大中城市。

再看方言与趋普方言的使用人数。趋普方言为各地的新派方言。按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研究,新派方言使用者多为时年 30 或 40 岁以下的中青年(方言的分派虽不唯年龄,但年龄是主体)。这部大词典的分卷本出版于 1993-1998 年,距今已 20 年左右,当时的“中青年”今已五、六十岁,而当今的中青年所承继的趋普方言只会更趋同于普通话。从年龄结构看,当今趋普方言的使用者多在 50 或 60 岁以下的人群中,其人数众多自不待言。各地“正宗方言”(老派)的使用人群至少已是 60 岁或更高龄的人群,人数远不敌趋普方言。现今做方言调查时寻找老派方言发言人不易,也是佐证。这是大中城市的情况,乡镇、农村及边远地区县城的情况需要调查核实,目前还不能并论。

从语言接触视角看,两种中间样态是动态的、不稳定的,地方普通话是以普通话为目标语的中介语,趋普方言是因普通话的优势渗透而出现的异化方言。四者的相互关系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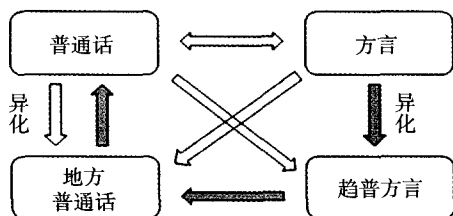


图 2 当代汉语四阶连续体关系

普通话和方言居汉语四阶连续体的两端。普通话因加入方言成分异化为地方普通话,地方普通话是带有方言色彩的异化普通话;方言因向普通话靠拢而成为有异质的趋普方言,趋普方言是因普通话影响而出现的异化方言。方言向普通话靠拢是主流,其路径大致如图 2 实

心箭头所示:方言异化为趋普方言,趋普方言或方言转换成地方普通话,地方普通话最终趋同于普通话。当然,此路径会有反向,但系支流;同时还有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使方言固守、强化或增生与普通话相异的特点,但系旁流;都改变不了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大势。限于篇幅,同时也避繁就简,本文集中讨论与论题相关的普通话与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必要处论及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在图 2 的演化路径中,有两个语言结构演化的节点,也是四阶体的衔接点,即两端与两中间体之间的“异化”。这是本文的关注点。我们想知道:地方普通话吸收了方言的哪些成分、发生了何种变异? 趋普方言削弱或消解了方言的哪些特征而趋同于普通话?

在语言各子系统中,语音最外层、最具系统性,方言间的差异以语音最为表层、直观,故本

^③ 感谢王洪钟教授、武文翔讲师、吴浩老师以及他们所属的浙江师范大学、南京晓庄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普通话测试站的帮助。

文讨论语音变异。下文从个案切入,分两节阐述汉语四阶体两端与中间体之间的语音变异。两中间体“地方普通话”与“趋普方言”下文分别简称“地普”与“普方”。

2. 地方普通话的变异:以苏州铁路窗口话为例

苏州铁路窗口话是一种苏州地方普通话(简称苏铁普),它以普通话为底本语,吸收苏州方言的某些成分而形成。根据专项调查^④,苏铁普有4个等级,对应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二甲、二乙、三甲、三乙。本节先陈述苏铁普音系的典型特点,再讨论其变异。

2.1 苏铁普音系典型特点

与普通话音系比,苏铁普音系有10个特点。这10个特点因音系负荷量、音系面貌贡献度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音系地位与作用。音系地位高、音系作用大的为典型特点,音系地位低、作用小的为非典型特点。依据结构地位、音位价值、分布范围等原则,判定以下4个特点是苏铁普音系的典型特点^⑤。(下表所用国际音标多省去“[]”)

表2 苏铁普音系典型特点

序号	特点名称	特点内容
I	鼻韵尾合一	普通话以 ə, i 为韵腹的 -ŋ、-n 两韵尾苏铁普合为 -ŋ
II	平翘舌不分	普通话的 tʂ tʂʰ ʂ, 苏铁普有时是 ts tsʰ s
III	上声不曲	普通话上声 214 苏铁普为 213、224、21
IV	加喉塞尾	中古入声字苏铁普加喉塞尾

考察这些典型特点的分布,可剖析苏铁普的异化路径以及苏铁普音系特征与异化路径的关系。

表3 苏铁普典型特点的分布

	二甲	二乙	三甲	三乙
I 鼻韵尾合一	+	+	+	+
II 平翘舌不分	+	+	+	+
III 上声不曲		+	+	+
IV 加喉塞尾				+

表3显示:苏铁普4个等级所拥有的典型特点数量随等级的降低而递增(括号内数字是典型特点的数量):

$$\text{二甲}(2) < \text{二乙}(3) / \text{三甲}(3) < \text{三乙}(4)$$

二乙与三甲都有3个典型特点,二者的差异由典型特点II的异读率体现。

苏铁普的4个等级与普通话的差距也随等级的降低而递增:

$$\text{二甲} < \text{二乙} < \text{三甲} < \text{三乙}$$

这就是说,拥有的典型特点越少越接近普通话。三乙磨蚀了特点IV便成为三甲,三甲降低特点II“平翘舌不分”的异读率便成为二乙,二乙磨蚀了特点III便成为二甲。如果二甲磨蚀了特点I、II或降低其异读率就会成为一甲或一乙,成为标准普通话。

可以说,地普向普通话演进的过程就是逐步减少、降低地普特征而趋同于普通话。

^④ 原铁道部科技司课题“铁路窗口用语与方言的交互影响”(1996-2000)。

^⑤ 具体论证参看刘俐李(2003)。

2.2 苏铁普音系变异

方言接触与语言接触有同有异。最大的不同在于各方言有共同语,而接触的语言各自独立没有共同语。有共同语的方言间在语言系统上有相当程度的对应甚或相同,接触语言学的一些概念不完全适合本文的方言接触研究,如“母语底层”。首先,四阶体同源,音系对应比较整齐,彼此所吸收的对方成分何为“母语底层”,有时很难判断。其次,“母语底层”关注目标语中的异源成分,而本文关注两中间体音系的变异,关注对象与目标均不同。第三,“母语底层”的语义预设多为目标语强势而母语弱势,然就本文研究变异所涉音系而言,四阶体各自相对独立,无关强弱。此外,“强弱”的基础应是使用人数和流通域。而普通话与地方普通话的强弱目前难定伯仲:就流通域而言,前者宽于后者;就使用人数而言,后者众于前者。故此,本节使用以下中性概念做音系变异分析。

互协变异:母语与目标语的对应成分间调和互协,生成一种非此非彼而又接近彼此的成分。

侵染变异:母语成分进入目标语,占位目标语而发生变异。

就苏铁普与普通话的关系而言,普通话是目标语,苏铁普是学习普通话过程中的变异体。

苏铁普使用者为普通话与苏州话双方言人,苏州话是母方言,普通话是目标方言。两种语码频繁转换,两音系频繁碰撞,必然发生变异。因异语/异方言参与而引发的变异为异源性变异,无异语/异方言参与而出现的自身变异为自源性变异。苏铁普典型特点 I、II、IV 均有苏州话成分介入,为异源性变异;典型特点 III 无苏州话成分介入,为自源性变异。先讨论异源性变异。从外部看,两音系相碰,会发生互协或对抗。互协必有退让,退让就有变化,协调点就是变异点,协调的目标多趋同于目标语。对抗会导致异语成分介入,异语成分如占位目标语音系必然导致目标语变异。

从音系内部看,自身结构的不平衡易引发互协变异,两音系结构成分的不对应或缺失会导致对抗从而引发侵染变异。

互协和侵染是异源性变异的主要方式。

苏铁普典型特点 I、II、IV 是异源性变异的结果,分属互协变异(I、II)和侵染变异(IV)。

2.2.1 异源性结构互协变异

结构系统中的不平衡不对称单位因缺少对称成分的牵制而成为结构互协变异点,结构体中的弱项也是易变点。结构体弱项指结构体中的非核心成分,其音质不稳定或不完整,如非韵母核心的韵尾:元音韵尾音质不稳定,辅音韵尾多无除阻段。当接触双方均有不平衡不对称单位或均有相应的结构体弱项时,就易发生变异,如[-n][-ŋ]的并合。普通话与苏州话都有鼻音韵尾[-n][-ŋ],且都是韵母结构中的弱项并为韵母系统中的失衡单位。在韵母结构中,韵尾弱于韵头与韵腹,是结构中的弱项;而鼻音韵尾又是不完全辅音,因不完整而自身不强,故在汉语各方言中鼻音韵尾的弱化甚至脱落比比皆是。其次,北京音系原本有元音、塞辅音、鼻辅音整齐对应的三分韵尾系统,13世纪时因[-p][-t][-k]的消失而退变为元音、鼻辅音二分系统,到17世纪鼻音中的[-m]又消失(邵荣芬,1979:84-86)。苏州话的韵尾塞音[-p][-t][-k]变为[-ʔ],[-m]也消失。普通话与苏州话两音系中的韵尾鼻音先是完全或部分失去同为辅音的结构对称体[-p][-t][-k],接着失去同为鼻音的结构对称体[-m],成为韵母系统中的失衡成分,剩余的两个韵尾鼻音自然不稳固。根据现有资料,能与北京一样保持[-n][-ŋ]分立的,还有沈阳、郑州等地方言。而多数方言都在变,只是演进方式不同,有的只有[-ŋ]没有

[-n],如:济南,太原,西安,昆明,南京;有的只有[-n]没有[-ŋ],如兰州。有的方言虽然[-n] [-ŋ]都有,但已在合并,比如高元音后的[-ŋ]并入[-n]:苏州,长沙,南昌等。梅县虽保留[-m],但同时高元音后的[-ŋ]并入[-n]:“程”读[ts^hən],“京”读[tɕin]。福州辅音韵尾只有[-ŋ]与[-ʔ]。厦门[-n] [-ŋ] [-m]与[-p] [-t] [-k]俱全,但有的鼻音韵尾弱化,只保留为元音的鼻化:监[ã],婴[ẽ]。⑥ 韵尾鼻音的进一步合并是大势所趋,北京等少数方言点就处在韵尾鼻音动荡的包围中。

韵尾鼻音既是音系中的不对称单位,又是音节结构中的弱项,这在北京话和苏州话中相同。因此,当两个音系在苏铁普高频接触时,就成为变异点。苏铁普所合并的普通话高元音后的[-n] [-ŋ],非[-n]非[-ŋ],其舌位比[-n]后,比[-ŋ]前,是舌面的[-ŋ̟]。[-ŋ̟]当为互协、中和之结果。

再看[tɕ]组→[ts]组的混读。普通话有[ts][tɕ]两组声母,苏州话统作[ts]组,含普通话的[tɕ]组。苏铁普要从[ts]组改回[tɕ]组。此间首先要学会发翘舌音,苏铁普[tɕ]组舌尖比普通话略前(刘俐李,2003),是苏州话[ts]组与普通话[tɕ]组音质的互协。其次要在母语的[ts]组中选字改读翘舌音,于是在[ts]与[tɕ]之间游移,难以整齐划一。或[tɕ]或[ts],逐字选择,因字而异,因人而异,参差错落,并无章法。故此,[tɕ][ts]两组的异读率成为区分苏铁普二乙与三甲的尺度。

2.2.2 异源性母语侵染变异

典型特点Ⅳ将苏州话的喉塞音韵尾[-ʔ]带进苏铁普,是母语侵染所致。[-ʔ]是苏州话的人声韵尾,是苏州话的典型特征之一,普通话没有对应成分,二者无协调点,于是直接进入。苏铁普的[-ʔ]韵尾是母语侵染的鲜明印记,只出现在苏铁普最低等级的三乙中。[-ʔ]韵尾从韵母的音段层进入苏铁普,而与[-ʔ]尾韵相伴的人声调并未同步进入苏铁普。

2.2.3 自源性变异

声调是语音的外层结构,通常先为学习普通话者习得。苏州话7个声调,四级苏铁普都是4个声调,均系普通话调类系统,但调值会发生变异。最典型的是上声,不是[214],而是[21][224][213]。普通话上声有多个变体,在词以上的语音链中,变体[21][34]的出现频度要高于本体[214]。苏铁普上声单字调或取普通话语音链中的[21]以及近似[34]的[224],或取[213],发生了接近目标语的相似性微变异。这一变异发生在习得调类后,是在普通话声调系统内发生的调值变异,没有母语声调成分介入,是自源性变异。虽然苏州话与普通话上声主体都源自中古上声清、次浊声母,二者大体对应,但苏州话上声调值[52](刘俐李等,2007),与普通话的[214]迥异,无法介入。

综上,经自源性变异和异源性变异,苏铁普改造了普通话音系,成为普通话的地方变体。

2.3 地普的高阶特点与低阶特点

不同等级的地普与普通话的接近程度有高低之分。最接近普通话的可称作高阶地普,即二甲地普;其余三级(二乙、三甲、三乙)可统称作低阶地普。高阶地普具有的典型特点为高阶特点,如苏铁普音系的典型特点Ⅰ与Ⅱ;仅出现于低阶地普的典型特点为低阶特点,如苏铁普音系的典型特点Ⅲ与Ⅳ。

高阶地普特点分布范围广、共性强,低阶特点分布范围窄、共性弱。如苏铁普的典型特点

⑥ 参看袁家骅(1983:28、59、103、128、148-149、180、238-239、283);詹伯慧(1981:38-41)。

I与II,分布于苏铁普的高、低两阶;而典型特点III与IV,只分布于低阶。苏铁普的两个高阶特点很有张力,上海、南京的铁路窗口用语也有此特点。例如“正、朋、丰、胜、程、行、经、听、姓、京”等字,上海、南京的列车播音员多是[-ŋ]尾,与“镇、盆、分、甚、陈、忻、今”不分。苏州、上海电视台的有些播音员也常将[-n][-ŋ]尾读成[-ŋ]。普通话鼻韵尾[-n][-ŋ]的混同并不只限于沪宁线周边地区,而是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见上2.2.1节)。 $[tʂ]$ 组与 $[ts]$ 组的分混也同样遍布全国各地。鼻音韵尾[-n][-ŋ]不分、平翘舌声母混同成为全国推广普通话的两道普遍性难题。

在“低阶地普→高阶地普→普通话”的演进路径中,低阶地普磨去低阶特点演升为高阶地普,高阶地普磨去高阶特点则与目标语普通话重合。低阶特点的方言色彩强于高阶特点,“棱角”突出,易于磨平。高阶特点分布范围广,说者人数众多,生命力强,因此,高阶特点不如低阶特点那样易于磨蚀。

苏铁普的高阶音系特点为异源的互协变异所致,低阶特点为异源的侵染变异所致。这就是说,在地普音系中,互协变异形成的高阶特点的普适性强、生命力较强、存活期较长;侵染变异形成的低阶特点普适性较低、生命力较弱、存活期较短。地普向普通话演进的过程就是不断磨蚀低阶特点、向高阶地普进发的过程。就人群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阶地普人数将会逐年多于低阶地普。

3. 趋普方言的变异:以南京话为例

南京人心目中的“正宗南京话”现在难觅真容^⑦。“正宗南京话”是未发生趋普变异的老南京话。目前通行的南京话多被南京人称作“南普”(南京普通话),包括南京电视台方言频道主持人的南京话。“南普”实际是老南京话的趋普变异。虽然其间并存周边方言影响的逆向变异,但趋普是主流。本节以南京方音1929年至2010年的变化为例阐述趋普方言的变异。

自20世纪初至今,南京方言的研究未曾间断,不同时期都有一些有价值的文献。本节选择4种,连同笔者近年的研究,分期考量南京方音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今80多年的变化。

赵元任《南京音系》(1929)记录了南京人心目中的正宗南京话,归纳了南京方音的9个特点及其内部分派的3个语音特征。本文选用这9个特点再加1类分派语音特征(有无撮口韵)来考量1929年之后4个时期的方音变化。鲍明炜《南京方音中几个问题的调查》(1961)^⑧与《六十年来南京方音向普通话靠拢情况的考察》(1980)专题研究当时南京方言老、中、青少年3个年龄段的语音变化,刘丹青《南京方言词典·引论》(1995)报告了当时南京方音最老派、老派、新派与最新派的方音变化。笔者2010年与2014年两次调查南京方言,做了不同年龄(老、青)与性别的相关研究^⑨。这五种资料时序相接,有可资对比的同类语料,是本节研究的依据。其年代跨度如下表4。第5种以2010年资料为主。

⑦ 2010年南京市语委海选南京方言数据库发音人,市民踊跃报名。我们用老南京话的特点制成试卷测试百余名发音候选人,无一人合格。

⑧ 该文以“南京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小组”之名发表于《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八本)》,由鲍明炜先生于1957年带领南京大学中文系1953年与1954年两级语言组学生调查完成。

⑨ 2010年建设南京方言数据库,此属国家语委“江苏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子项目”(WT115-16(03)),侯超为主要成员之一。如前注^⑦所言,南京市民150余人报名争做南京方言发音人。初审合格120余人参加南京话测试,本节资料多取自此次测试。因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方言自然口语有声基础语料库建设”,2014年再次调查。两次调查的主要发音人相同。后文不复注。

表 4 五时段南京方言资料的年代跨度

时 段	1929-1961	1961-1980	1980-1995	1995-2010
间隔年数	32	19	15	15

除 1929-1961 跨度较大,后三段时间跨度相近。如以 20 年为一代,1929-1961 跨时一代半,而此段南京方音变化不大。1961-1980 有一代跨度,后两段跨时接近一代。语言/方言是代际传承,上述资料的时间分布与本文研究主旨相合。1961、1980、1995 与 2010 均有年龄分段研究,4 个时段的语音变化可叠代互证。

表 4 所记年份是文献发表或研究的时间,但所记语料的时效不只限当年,应含其前后几年的一个时期,故此,本文以“时段”指称,如“1929 时段”,指 1929 年前后的这一时期。有时省去“时”“时段”,如“1961 时段”简作“1961 段”或“1961”。

各文献中的方言分派是本节讨论的基点。方言分派主要以年龄为据(但非唯一),讨论前需先理清各时段方言分派与年龄的对应关系。鲍明炜文(1961)老、中、青少年发音人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64、32、16 岁(根据该文资料计算);1980 年的发音人情况未刊,但可推算。刘丹青(1995)以 80 岁、55 岁、25 岁分割 4 派:最老派 80 岁以上,老派 80-55 岁,新派 55-25 岁,最新派 25 岁以下。本文 2010 段的老年 1941-1950 年出生(时年 60-69 岁),青年 1971-1980 年出生(时年 30-39 岁)。4 时段各派发音人的对应大体如下表。表中发音人的年龄据各文献,有的经过换算,出生年份经计算得出,只有 1980 段青少年的出生年份为估算。

表 5 各时段发音人的派别对应

	1961 时段	1980 时段	1995 时段	2010 时段
生于 1897 年前后	老年(64 岁)		最老派(1915 前生)	
生于 1929 年前后	中年(32 岁)	老年		
生于 1945 年前后	青少年(16 岁)	中年	老 派(1940 前生)	老年(1950 前生)
生于 1965 年前后		青少年	新 派(1970 前生)	
生于 1970 年后			最新派(1970 后生)	青年(1971 后生)

1961 段的中、青年到 1980 段为老、中年,对应整齐。其后 3 时段各派对应略有交叠,但大体是每前进一时段发音人则进升一个派阶。如 1961 的青少年(16 岁)是 1980 的中年(35 岁)、1995 的新派(50 岁)、2010 的老年。

3.1 南京方音 80 年变异描述

下页表 6 汇集了南京方音 10 个特点 80 多年的变化。以赵元任(1929)的 10 个特点为基点,对比排列 1961、1980、1995 与 2010 等 4 时段的变化。前 9 个特点取原文排序,第 10 个是本文补加的原文方言分派的语音特征。表 6 转述 10 个语音特点时,或沿用原文或据原文修改,以晓白为要;个别重复处未取。陈述 4 时段的变化以简明易懂为要。特点 2 原有“ei 音值作 əi”,但 4 时段无此条记录或记录不详,未取。表中每格右下角的“+”表示变异的轻重:+轻,++较重,+++重,++++最重。本节及后文中的国际音标多省去“[]”。

表 6 中 10 个特点的变异不都因普通话影响而发生,既有周边方言的影响,“主要是苏北话和皖北话”(鲍明炜,1980),也有南京方言自身与普通话同向的自然演化。普通话与周边方言的影响均系外力,但普通话影响力强于周边方言,周边方言自身也有趋普走势。南京方言自身系统的定力是内力。外力触动内力才能生变。普通话诱发趋普变异,而周边方言既引发趋近

表6 南京方音特点 80 年变异汇集表(1929-2010)

	1929(赵)	1961(鲍)	1980(鲍)	1995(刘)	2010(本文)
1	别处的 a 读 ɒ	老年读 ɒ, 中年 ɒ/ æ, 青少年 æ ++	老年残存 ɒ, 中青 少年无 ɒ +++	最老派女性有 ɒ, 其 他全无 +++	只老女有 ɒ +++
2	别处 ai 为 aæ			最老派有 ae, 老派 ae 动程变小, 两新派 变 e ++	ae 全变 e ++++
3	阴平念低音	322	31	老派 31, 新派 41 ++	青老均 41 ++++
4	n、l 不分	n、l 不分	n、l 不分	n、l 不分	n、l 不分
5	分尖团音	老年分尖团, 中年 以下几乎不分 ++	全不分尖团 ++++	最老派分, 老派只 3 韵分, 新派不分 ++	部分老年多分于 2 韵; 青年多不分 +++
6	“边、写”韵母 en、 e(无韵头 i)	中老年保留, 青年 混乱 +	少数老年保留, 其 他人变 +++	老派残留, 新派均改 ien、ie +++	老年残留, 青年改 iē、ie +++
7	an-aŋ 不分	大多不分, 个别分 +	老年多不分, 青少 年多分 ++	最老派、老派、新派 不分, 最新派分 +	老年多不分, 青年多 分 ++
8	有高而短的人声	人声短而高	人声短而高	人声短而高	人声在长化 +
9	儿化韵多, 将齐齿 变为开口			最老派多, 老、新递 减, 最新派极少 ++	老年有 67% 儿化, 青 年有 55% +
10	撮口有人无、有人 有	无撮口者多, 有撮 口者少 +	无撮口者少有, 撮 口者多 ++	最新派有撮口, 另三 派文化人有、体力劳 动者少 +++	老年青年全有撮口, 但个别字仍用齐齿 ++++

自身的“趋方”变异,也诱发或强化南京方言的趋普变异;南京方言内力引发的变化也有趋普和固守自身特点的两个方向。这三股力量或单力或合力作用,使南京方言演化或变异。引发变化的力源种类有的清晰可辨,有的难辨。例如平翘舌音的变化,1929年《南京音系》记音“招_ʈ-糟_ʈ”,2010年我们调查55位南京人,28人同此未变,27人不分平翘舌均变读_ʈ,与扬州、溧水、句容、镇江相同^⑩,这是周边方言影响的“趋方”变异,但字数不多^⑪。南京方言尖团音由分到不分,是普通话与周边方言的双重作用(周边方言多不分尖团)。an与aŋ的分合,周边方言有合有分。合的如江宁、江浦、六合、仪征;分的如句容、溧水、镇江、扬州,但与an对应的是ā、æ、ē/ō、ǣ。南京an与aŋ分音是否源自周边方言颇难断定,但读an应来自普通话。n与l不分是分布范围广的方言特点,江苏境内的42县市江淮方言中,29个不分(23个读l,6个为n),南京固守n与l不分而跟普通话相异,应是内外合力所致。入声长化是江淮方言普遍趋势(刘俐李,2013),南京方言从之。阴平的低降、中降周边方言均有,如江苏的江淮方言阴平[21]有11处,[31]有13处,[42]有5处,南京的[41]应是周边方言与自身合力调节的结果。儿化词的减少似是背离普通话,其实不全然。南京的儿化将齐齿变开口,变韵方式异于普通话,例如“点[tie]-点儿[tər]”。减少儿化词即减少了儿化中异于普通话的齐齿变开口,字音趋普。减少儿化是词汇普而字音趋普。但何力所为难以尽辨。

综观表6的10个特点,第4“n、l不分”固守了方言特点,第3、8阴平与入声的变化是方言

⑩ 本节江苏境内的方言资料均见鲍明炜(1998)。

⑪ 2014年调查南京老男4002字中普通话翘舌读平舌的有“士、仕、柿、事、师、狮、视、侍、溯、疹”。

声调系统的调整,难以简单判断其趋向,其余7个特点均减少了与普通话的差异而趋普(无论变异力来自何方)。可以说,趋普变异是南京方言近80年来演化的主流。下文根据表6的10个特点计量其变异度,分时段对比南京方言自身特点80多年来的消长,考察其趋普大势。

表6中1961与1980有4个空格无记录,但其后两时段有记录,不影响最终判断。

1961段有5个特点开始变化(有“+”的格),另5个未变。1980段此5点变化加剧。1995段变化点增至8个,2010年增至9个,同时前一时段开始的变化此两时段多加重。逆变有3处,特点5(分尖团)和7(an与an_ɿ不分),1995段的变化轻于1980段;特点9儿化韵的变异2010略轻于1995。10个特点变化的总趋势是逐年萎缩。

3.2 南京方音80年变异赋值与计量

用“+”多少表达变化程度不如数字简明,赋值计量比符号描述更直观。本节先给变异点赋值然后计量变异进程。依据表6赋值,生成表7。赋值方法见下页。表7的方言分派用简称,如1995的四派简称“最老、老、新、最新”。各特点的变异也用最简语句陈述。表7每一特点的第2行是所赋变异值。

表7 南京方音特点变异度赋值表

	1929的方音特点	1961	1980	1995	2010
1	别处的a念ɒ	老ɒ,中ɒ/æ,青少æ	老残存ɒ,中、青少无ɒ	最老女ɒ,余无	老女ɒ,余无
		0.5	0.83	0.88	0.88
2	别处的ai为aæ			最老ae,老ae动程变小,两新ε	全变ε
				0.63	1
3	阴平念低音	322	31	老31,新41	青老全41
		0	0	0.5	1
4	n,l不分	n,l不分	n,l不分	n,l不分	n,l不分
		0	0	0	0
5	分尖团音	老分尖团,中青少不分	全不分尖团	最老多分,老分于3韵,两新不分	少数老分于2韵;青略分
		0.66	1	0.75	0.8
6	“边、写”韵母en、e(无韵头i)	老中留,青乱	少数老年留,其余变	两老残留,两新变	老残留,青变
		0.17	0.83	0.85	0.85
7	an与an _ɿ 不分	大多不分,个别分	老年多不分,青少年多分	两老与新派不分,最新派分	老多不分,青多分
		0.2	0.5	0.25	0.5
8	有高而短的人声	入声短而高	入声短而高	入声短而高	入声在长化
		0	0	0	0.25
9	儿化韵多,将齐齿变为开口			最老多,老、新递减,最新极少	老保留67%,青保留55%
				0.5	0.39
10	撮口有人无、有人有	撮口无者多,有者少	撮口无者少,有者多	最老、老、新不全有,最新派有	全有撮口,只几字保留齐齿
		0.25	0.75	0.82	0.95

变异点是赋值基本单位,为每一时期的每一方音特点,即表6的每一方格。每一变异点赋值0-1;0为无变异,1为完成变异,0-1间的小数标记未完成的变异进程,其分值由方言分派数目及方言特点的变异度合成。一级分值是派别值,由派别数等分该点总值1,每派别分值有1/2(2010)、1/3(1961、1980)、1/4(1995)三种。二级分值为各派的变异度,派内多数人变异取一级值的2/3,少数人变异取1/3,一半变异取1/2;特点自身整体变或局部变异的赋值以此类推。例如1995时段的特点1为“最老派女性有ɒ,余无”,4派中有3.5派变异(最老派只男性有变),其变异值=0.25/2(老男)+0.25*3(另3派)=0.875,每一变异点赋值只取2位小数,0.875四舍五入为0.88。无记录的4个空格不赋值。

将表7简化为表8,并按变异度高低另排序。

表8 南京方音变异度统计表

序号	表7序号	南京方音特点(1929)	1961	1980	1995	2010
1	2	别处的 ai 为 aæ			0.63	1
2	3	阴平念低音	0	0	0.5	1
3	10	撮口有人无、有人有	0.25	0.75	0.82	0.95
4	1	别处的 a 念 ɒ	0.5	0.83	0.88	0.88
5	6	“边、写”韵母 en、e	0.17	0.83	0.85	0.85
6	5	分尖团音	0.66	1	0.75	0.8
7	7	an-aŋ 不分	0.2	0.5	0.25	0.5
8	9	儿化韵多,齐齿变开口			0.5	0.39
9	8	有高而短的入声	0	0	0	0.25
10	4	n、l 不分	0	0	0	0
总 计			1.78	3.91	5.18	6.62

表中“总计”是各时段10特点变异度总和。因底数为10,这4个总值可直接换作百分比:1.78→17.8%,3.91→39.1%,5.18→51.8%,6.62→66.2%。表8显示:

- 1) 1961年的变化为17.8%,与1929年的差距不大;
- 2) 1961年至2010年变异度递增:1.78<3.91<5.18<6.62;
- 3) 1980年后变异加剧,已变化特点的变异值多大于0.5;
- 4) 2010年时段变异度最高,总值6.62,表明南京方音特点整体萎缩6成多;
- 5) 10个特点中有9个发生变异;
- 6) 未发生变异的是声母“n、l不分”。

以上统计表明,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来南京方音特点萎缩加剧,与普通话的差距明显缩小,趋普进程加快。

需要说明两点:第一,赋值计量只是将方言现象大体量化,不是严格意义的数据统计,最终结果是近似值,不是分厘不差的精确值;第二,赋值计量的是南京方言自身的变异度,不是趋普度,但如前所述,变异的总趋势是趋普。

3.3 2010 南京方言的趋普变异

上节赋值计量结果表明,2010时段的南京方音变异度最高,但没有论证。本节取表8第6、7、8特点(尖团音、[an][aŋ]、儿化韵)举证阐述。这3个特点的变异值居中偏后(0.8-0.39),并都有逆变(后时段变异值低于前时段),尤需论证。另加补特征字音“去”的方音变异。本节选用2010年调查的55人资料,其中1941-1950年出生者男21、女16人,1971-1980年出

生者男、女各9人。前者为1961时段的青少年、1980的中年、1995的新派,后者为1995的最新派。

3.3.1 尖团音的分合(2010)

1929时段的南京方言分尖团音。1961时段“城内南部老年人几乎全部能分,中年以下几乎全部不分”,1980时段“已经全部不分尖团了”(鲍明炜,1980),1995时段“最老派分尖团……但有些最老派在尖团上已向老派靠拢。老派只在[ie][ien][ieʔ]三韵前分尖团;在其他细音韵母前不分尖团”(刘丹青,1995)。根据文献所举字音判断,新派与最新派不分尖团。2010的调查结果与1995近似,尖团音未完全并合。

2010年用“挤-几、聚-巨、焦-交、酒-久、精-金、蒋-讲、尖-间、全-权、接-结、绝-决”10组字测试老年,用前5组字测试青年。55人中有15人能区分少量字组的尖团,其余40人完全不分。能区分者老年13人(男4、女9),青男2人。最多能区分4组,只1人,其余能区分3组者3人、2组者6人、1组者5人。9位青女全不区分。15人能区分的词语不一致。还有人颠倒尖团,或全为尖音。能区分尖团的词语集中于“尖 tsie-间 tɕie,接 tsieʔ-结 tɕieʔ”两组。总体而言,2010时段的区分是零星的、非系统的,呈现出尖团音彻底并合前的凌乱。以下分人数与词语两类统计,用“略分”指称“区分尖团音”。

表9 2010南京方言尖团音分合统计

		老男		老女		青男		青女		总计	
按人计	略分	4人	19%	9人	56%	2人	22%	0人	0%	15人	27%
	不分	17人	81%	7人	44%	7人	78%	9人	100%	40人	73%
	总人数	21人		16人		9人		9人		55人	
按字计	可分	8组	4%	17组	11%	5组	13%	0组	0%	30组	7%
	不分	202组	96%	143组	89%	40组	87%	45组	100%	430组	93%
	字组总数	210组		160组		45组		45组		460组	

下面将表9上部数据制成图3,下部数据制成图4。

图3显示,无论老年青年,不分尖团者为多数,只是青年不分尖团的比例远大于老年。图4显示,尖团的区分集中于“尖-间、接-结”两组,与1995“尖团分于三韵”的结论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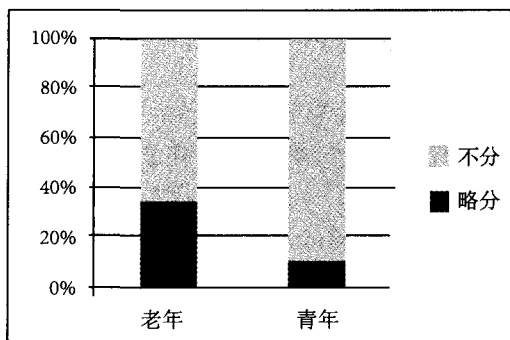


图3 老青两代分尖团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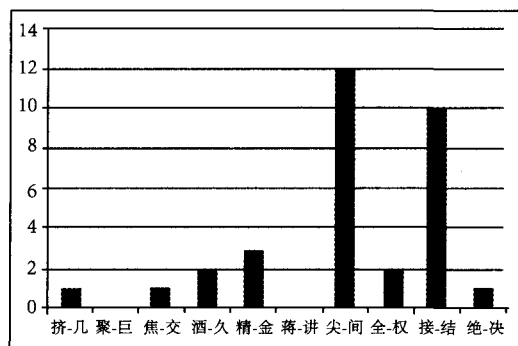


图4 分尖团的字组

3.3.2 [an][aŋ]的分合

1929时段的南京方言[an][aŋ]不分。1961时段“三十八人当中能够区分的只有一个人”,1980时段“四十一人中有一半能区分……能区分的多是青少年,不能区分的多是老年人”

(鲍明炜,1980),1995 时段“最老派、老派、新派都无别,只有新派有区别”(刘丹青,1995)。

2010 的调查结果是老年多不区分,青年多可区别。测试字组是“板-绑、摊-汤、官-光”。有 4 种情况:3 字组全分,只分 2 组,只分 1 组,3 组都不分。前 3 种都可区分[an]与[an̩],只是程度不同,计为可分类,第 4 种为不分类。统计数据见下表 10 上部。表 10 下部是具体字组分合的统计,可弥补按人数统计的不足。3 字组不分者多数为[an][uan],有 2 人全为[an̩][uan̩],6 人“板-绑、摊-汤”为[an]、“官-光”为[uan̩]。区分 2 字组者中有 2 人分别颠倒“摊-汤”与“官-光”鼻韵尾。这些情况多发生于老年人群。青年多集中于[an][an̩],有 1 人颠倒混读。

表 10 2010 南京方言 an/an̩ 分合统计

		老男		老女		青男		青女		总计	
按人计	可分	3 人	14%	6 人	38%	7 人	78%	8 人	89%	24 人	44%
	不分	18 人	86%	10 人	62%	2 人	22%	1 人	11%	31 人	56%
	总人数	21 人		16 人		9 人		9 人		55 人	
按字计	可分	6 组	10%	13 组	27%	17 组	63%	18 组	67%	44 组	33%
	不分	57 组	90%	35 组	73%	10 组	37%	9 组	33%	111 组	67%
	字组总数	63 组		48 组		27 组		27 组		165 组	

将表 10 上部按人数统计的百分比制成图 5,下部按字组统计的百分比制成图 6。另将区分字组个数分类的数据制成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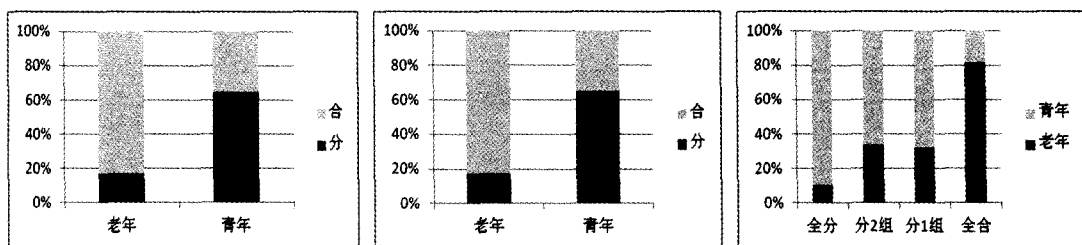


图 5 [an/an̩]分合人数统计 图 6 [an/an̩]分合字组数统计 图 7 [an/an̩]分合的类型统计

以上图表显示,无论人数统计还是字组统计,都是老年大多不分[an/an̩],青年大多区分。在图 7 的 4 种分韵情况中,青年与老年“全分”“全合”的对比也很显著。

3.3.3 儿化韵的变异

1929 时段“卷舌音甚多,而且卷舌韵往往将齐齿变为开口”(赵元任,1929)。1961 与 1980 段无记录。1995 段“最老派有丰富的儿化韵,往下各派依次减少,最新派只剩个别儿化词,儿化韵已不成系统”(刘丹青,1995)。2010 年用 10 个常用儿化词(一点儿、椅子背儿、土豆儿、酥蚕豆儿、蝴蝶儿、女娃儿、扒儿手、巴巴头儿、丫杈锤儿、花儿草)测试,55 人的统计数据如下。

表 11 2010 南京方言儿化韵保留情况统计

	老男	老女	青男	青女	老男	老女	青男	青女
儿化韵	139 词	109 词	55 词	44 词	66%	68%	61%	49%
非儿化韵	71 词	51 词	35 词	46 词	34%	32%	39%	51%
总词数	210 词	160 词	90 词	90 词	100%			

青年保留的儿化词略少于老年。将表 11 数据制成图 8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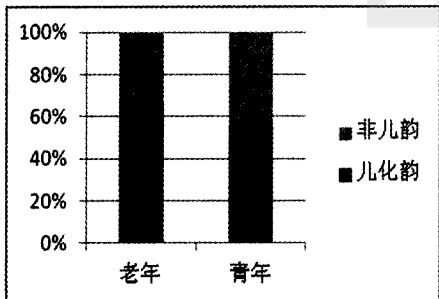


图8 老年青年保留儿化词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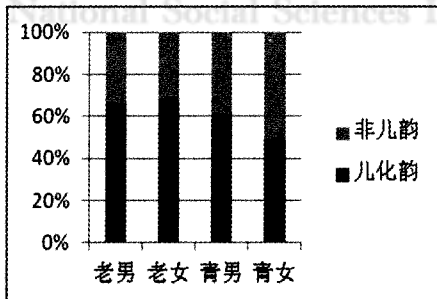


图9 老青男女保留儿化词比例

青年保留的儿化词少于老年 12 个百分点。儿化词的保留量按以下顺序递减：

老女 > 老男 > 青男 > 青女

这些图表数据说明：1) 老年保留的儿化词略多于青年；2) 老年与青年的差距不如尖团音与 an-an 两特点大；3) 青男的变化速率更接近老年。

如前所述，儿化词变异有背普、趋普两面：减少儿化词在词的层面背离了普通话，但在字音层趋近普通话。因此其演化进程中各方、各时段的数据对比不如其他特点显著与有序。

将上述 3 特点的变化汇总于表 12 并制成图 10。

表 12 南京方音 3 特点 2010 趋普变异总表

	不分尖团%		分[an/ag]%		儿化韵减少%	
	存旧分	新不分	存旧合	新变分	存旧儿化	新非儿化
老年	35	65	83	17	67	33
青年	11	89	35	65	55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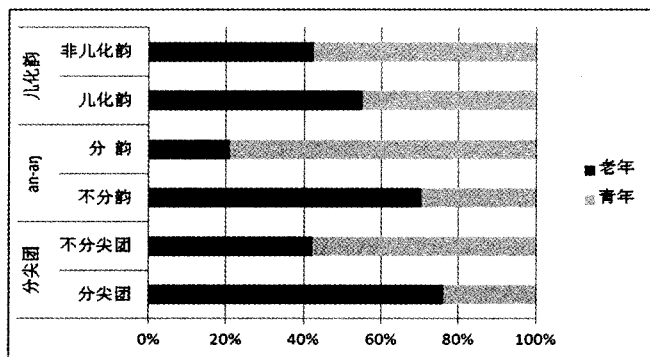


图10 南京方音3特点2010趋普变异总图

在 3 类变异中，青年的变异程度均大于老年。

3.3.4 特征字“去”的变异

“去”的读音是南京方言的特征之一。1929 时段有 ki、k^hi 两音，均为白读。1961 与 1980 没有记录。1995 两老派白读为 k^hi、文读为 tɕ^hy；两新派均为 tɕ^hy。2010 时段统计了 37 位老年的读音，有 3 种：k^hi、tɕ^hy、tɕ^hi，各种读音的人数见下表 13。

表 13 2010 南京老年“去”读音统计

	k ^h i	tɕ ^h y	tɕ ^h i	k ^h i/tɕ ^h y
男	4 人	11 人	5 人	1 人
女	7 人	4 人	3 人	2 人
合计	11 人	15 人	8 人	3 人
占总人数比	30%	40%	22%	8%

保留 1929k^hi 的人数占 30%，其余 70% 变为 tɕ^hi 或 tɕ^hy，其中有 8% 的人 k^hi/tɕ^hy 两读。tɕ^hi 应为 k^hi→tɕ^hy 的中间音，k^hi/tɕ^hy 两读是演化路径中的中间状态，变化全程应为 k^hi→tɕ^hi→k^hi/tɕ^hy→tɕ^hy。虽然普通话“去”在语流中也有 tɕ^hi 变体，这只能说明二者的音理相通，但并非同一音体。

3.3.5 南京声调的新见变异

表 14 1961-2010 的南京声调

调类	调型	1961	1980	1995	2010	
					老男	青男
阴平	降	322	31	31	41	41
阳平	升	113	13	24	24	24
上声	平/降	22	22	11	22	21
去声	平/降	43	44	44	44	43
入声	短	44	5	5	5	5

5 个声调、有入声是南京方言区别于 4 个声调普通话的重要标记。这一声调系统的结构特征 80 多年来一直未变。但具体调值，如调型、调高与调长等，均有一些变化。调值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调类，从而导致声调系统的结构发生改变。1961 沿用 1929 的 4 度标记法，这两时段的调类与调值都相同。1961 段的入声原文记作“44”，但文字说明是短调。1980 至 2010 采用 5 度标记，与前两时段不同。比较当用同一标度，本节阐述调值的数字标度时集中于 1980 至 2010。

阴平。1929 至 1995(老派)为低音，1995 新派变为中降 41，至 2010 青老年均为 41。

入声是南京方言作为江淮方言的标记。有塞尾、时长短是入声的特征。1929 时段的记录是“(喉部关闭作用)在入声字单念或在短句尾入声字重念时有之，平常入声字不过短就是了，并没有喉部关闭作用”(赵元任, 2002: 277)。这就是说，1929 时段的入声时长短，而喉塞尾在语流中多无，但在单字调中有。现在单字调的喉塞尾也在变：时有时无，因人而异、因境而异(宋益丹, 2009)。入声时长也在逐年变长。2004 年录音的南京入声相对时长为 0.69，舒声阴平是 0.79，只差 0.1，研究结论是南京入声正在长化(刘俐李, 2013)。2010 继续变长，以下是老男的三组入-舒对比字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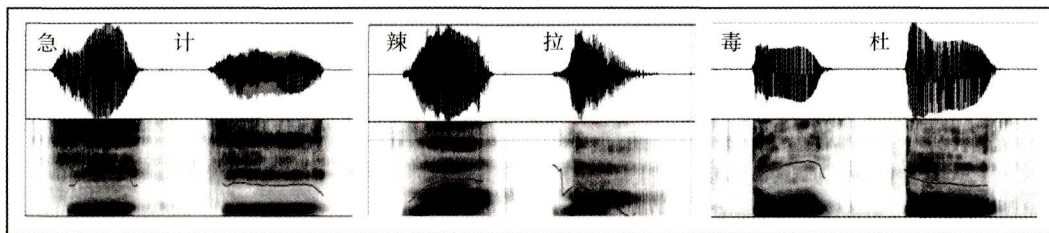


图 11 2010 南京入声长化对比例字

三组字的时长比:急/计=547/639=0.86;辣/拉=544/570=0.95;毒/杜=431/512=0.84。2004年录音的南京男性的入舒比为0.64(刘俐李等,2007),2010年以上三组字入舒比均值0.88,远大于2004年的0.64。从绝对值看,入声“急”547毫秒、“辣”544毫秒,比舒声“杜”(512毫秒)还长。

在2010年的调查资料中发现,有些人声字一些青年已转舒声,如:绿[ly⁴⁴],盒[xe²⁴],割[ke⁴¹]。

上声也在变化。南京上声自1929至1995一直是低平调([22]或[11])。2010段的老年仍保留[22],但青男变为[21],其他文献有相同的结论(汪莹,2014)。

2010年的老男上声为[22]。在核对该发音人2014年新录的4002单字音时,发现142字的声调有变,其中多为上声。让发音人自己听录音,多被认可,说无误。对比2010年与2014年的同字音档发现,仅隔4年,上声已有变化。表15是两上声字“两、左”基频均值。

表15 老男上声例字“两、左”音高对比(单位:hz)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起伏差
2010年	164	160	152	148	147	148	150	153	156	156	17-0-9
2014年	140	130	124	123	125	129	134	139	146	148	17-0-25

表中黑体数字是音高最低点,两端点p1、p10与最低点的基频差为起伏差。“起伏差”栏的3数字分别为起点-最低点-终点的起伏差。首尾点的起伏差大则声调的曲折度高,起伏差小则曲折度低。将上表制成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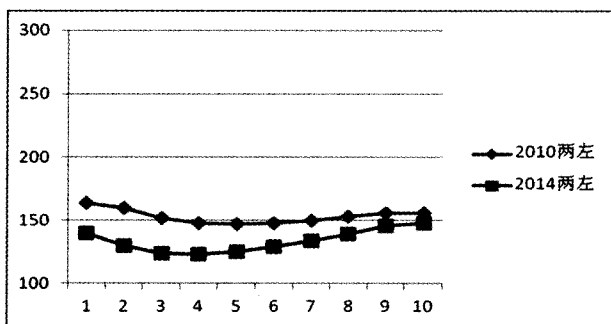


图12 南京老男同字4年间的起伏变化图

4年间,同一人同一字的音高由第2音区降至第一音区,同时终点的起伏差增加了16hz。16hz接近半个音区,说明原先的平调开始不平了。尽管老男上声的变化微弱、尚不成型,但说明青年上声的变化并非独行,还有相伴者。

2010段青年声调的变化,再次缩短了南京方言与普通话的距离。

2010时段的南京老年调型与1961、1995时段相同(见前页表14)。与普通话比,这三个时段的南京声调只有阳平与普通话调型相同——同为升调,其余均不同。2010段南京青年的上声、去声由平调变降调,去声调型变同普通话的降调,增加了一个相同调型(见下页表16)。而上声的21与普通话上声在语流中的变体相同,又加码了相同度。2010青年声调的这两种变化进一步拉近了与普通话的距离。

表 16 南京方言与普通话声调比较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调值	普通话	55 平	35 升	214 凹	51 降	
	2010 南京话老	41 降	24 升	22 平	44 平	5
	2010 南京话青	41 降	24 升	21 降	43 降	5

3.4 南京方音趋普变异解析

地方普通话与趋普方言都与普通话相关,但两两关系不同。于地普而言,普通话是目标语,二者同类,只是级阶不同,地普是标准普通话的低阶。于普方而言,普通话是共同语、标准语,普方是其地域变体,二者异类;普方植根于方言,与方言同类,二者级阶有别,普方是变阶,方言是本阶。因此,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进程中,地普与普方的语音变异方式不同,普通话的作用也不同。在地普语音变异中,普通话直接参与,发生异源性的结构互协与母语浸染。在普方语音变异中,普通话是定向标,不直接参与变异,在普通话引力作用下发生自源性变异。分析表 8 南京方音 10 特点的变异值,可探究趋普变异的一些细节。横向查看 4 时段 10 特点的变异总值可了解变异过程及趋势,纵向查看 2010 时段的 10 特点变异值可探究趋普变异方式。

3.4.1 蚕食性趋普变异

1961 时段的变异总值 1.78(满值 10),表明已有变异,但幅度不大,音系总貌与 1929 段接近。此段共有 5 个特点开始变,变异度均值 0.36。其中 3 个的变异值低于 0.25,意味着变异只发生于少数人中。这一时段推普时间不长。

1980 时段的变异总值 3.91,前期已变异的 5 特点加大幅度,变异度均值升至 0.78(满值 1),表明其变异已进入后期。此时推普已有 20 多年。

1995 时段的变异总值 5.18,变异特点增至 8 个,新增 3 个,变异面扩大;新增的变异度均值 0.54,与 1961 时段比,变异步伐明显加快。前期已变的 5 特点中有 3 个加大变异度,均值升至 0.85;2 个略有反弹,均值 0.5(原因待查)。此时推普已近 40 年,并开始推行普通话水平测试。

2010 时段的变异度总值 6.62,有 9 个特点发生变异,变异度均值 0.74。分值 0.8 以上的有 6 个,其中 2 个已完成变异,4 个接近尾声(均值 0.87)。至此,南京方音的 10 个特点整体磨蚀 6 成多。此时推普近 60 年,普通话水平测试推行了 16 年。

自 1961 至 2010 的半个世纪里,南京方音 10 个特点发生了蚕食性变异,由初期的 5 个推至 8 个、9 个,发生变异的人群由青年、中年到老年,逐年推进、逐代承传,到 2010 时段已被磨蚀 6 成多,1929 的《南京音系》已难见全貌,南京方言更趋近普通话。

变异的推进、加重与推普时间、推普力度成正比。

2010 年因建设南京方言有声数据库,南京市市民热议正宗的老南京话、反思方言变异,争做南京方言发音人,努力说“老南京话”。毕竟新南京方言已生成,刻意说“老南京话”,已言不从心。有人凭记忆能说出一二,但已不顺嘴、不完整,甚至走样。

3.4.2 虹吸式趋普变异

2010 时段是半个世纪来南京方音变异的集成熟期。10 个特点的不同变异值标度了各自的变异进程:1,1,0.95,0.88,0.85,0.8,0.5,0.39,0.25,0。见 3.2 节表 8。

前两个 1 标记变异完成,末位 0 标记未发生变异;中间的小数标记变异发生但尚未完成,变异值越大变异程度越高,反之则反是。

这 10 个变异值序列在第 6、7 位之间被分割:前 6 个分值在 0.8 以上,是高分,第 7 位后的 4

个在0.5以下,是低分。

高低分值的分垒与表6排序基本吻合:前6个高分包含表6的前5个特点(不含特点4)。表6取1929文献原序,以方言特点的显著度排序(不含特点10),这可以作者对表6特点1、2的评语为证:“以上两点是南京人到外头去的时候自己觉得最愿意掩饰的地方”。“最愿意掩饰的”正是方言特色最浓的,即标记性最强的。高分值特点排前位,是方言标记度高的特点,其趋普变异度也高;低分值特点标记方言的显著度相对要低,趋普变异度也较低。方言标记度与趋普变异度成正比。

前6个高分变异特点依次是(括号内是变异值):韵母[$a\ae$]变[ϵ](1);声调31变41(1);[i][iu]变撮口韵[y](0.95);元音[ɒ]变[a](0.88);“边、写”字音由[pen][se]变[$\text{pi}\epsilon$][$\text{ci}\epsilon$](0.85);尖音并入团音(0.8)。后4个低分变异点依次是:[an][$\text{a}\eta$]由不分变为分(0.5);儿化韵由多变少(0.39);高而短的人声开始变长(0.25);[n][l]不分(0)。变异值以该变异本身为据,未计其音值与普通话是否完全相同。

高分特点的方言标记性强、分布范围窄、共性弱,与地普的低阶特点相似;低分特点的方言标记性相对弱、分布范围相对广、共性相对强,与地普的高阶特点相似。在推广普通话的大潮中,方言标记性较弱的低分特点的普适性较高、生命力较强、存活期较长,因而变异度低;方言标记性强的低分特点的普适性低、生命力较弱、存活期较短,因而变异度高。方言的趋普变异实际就是不断磨蚀标记性特点、缩短方言与普通话距离的过程。

“ n 、 l 不分”在表6排第4位,在表8排末位,其位序变动有因由。“ n 、 l 不分”不独南京有,如前所述,其他江淮方言也有,同时赣语也不区分,有较广分布域。但南京声母[l]的音值特别,有较强的鼻音成分,其他方言的人很难模仿,这应是赵元任先生将其排在第4位的道理。音值特别的音是因为发音生理特别,发音生理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代代相传的生理习惯不易在较短时期里改变,因此,该特点被保留。所谓保留,是指该特点仍然存在,但并非与1929完全一样。1929是“ n 、 l 不分都并入 l ”,没有 n 。而1961-2010的4个时段都有 n (拼细音时),只是 n 、 l 是一个音位,可以互换,仍不区分 n 、 l 。

方言特点体现方言个性,方言辨识度高,与普通话差别明显。要趋近普通话就要磨蚀有棱角的特点,磨平个性,趋于普通。趋普是当下方言变异的主要动因。从变异属性看,磨蚀方言特点是方言系统的自组织行为,为自源性变异。但自组织行为的动因是趋近普通话,普通话是变异的定向标,如无此定向标,不会发生趋普变异。普通话虽未直接参与变异,但其定向与引力作用显而易见。定向与引力是虹吸现象的典型特征,趋普变异有此特征,是为虹吸式变异:在标准语的定向与引力作用下调整音系,改变标记性特点的音值而趋近标准语。

虹吸式变异由外力作用于本体,使其加速变化。半个世纪来南京方音变异成倍加速,超乎常态,当是虹吸式变异所致。南京方音在1929-1961的32年间变异值为1.78,年均增加0.056,1961-2010的49年间增加了4.84,年均0.099,后49年的年均变异增幅是前32年的1.77倍。近2倍的年均增幅涨势正是虹吸式强力变异的结果。

趋普变异的外力背景是推普。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推普,到90年代中期推行普通话水平测试,随着力度加大及岁月积淀,普通话对方言的作用力日渐集聚、加大。今60岁以下人群中的方言、普通话双言人比比皆是,方言的趋普变异日渐增强。

由外力作用的虹吸式变异对方言结构成分的调整最终受制于方言自身,即在方言系统可容可控的范围内调整改变,以趋近普通话。因此,趋普变异结果不一定与普通话完全相同。如

变异分值为1的“韵母[æ]变[ɛ]”,与之对应的普通话韵母是复元音[ai],2010的南京方言却是单元音[ɛ]。普通话的标准音北京音中,有人的[ai]动程不大,语流中有时也会是[ɛ]。

自1961至2010时段,在普通话的影响与作用下,经蚕食性变异与虹吸式变异,南京方言消解了1929南京音系60%以上的特征。尽管其间有周边方言影响而引发的趋近周边方言的变异,但总体减少了与普通话音系的差异,形成新的南京音系。

词汇的趋普情势更甚。2014年我们调查了南京方言(老年男性)5497词,经初步统计,纯粹南京方言词有20%,另80%都是用南京音说出的普通话词汇。

4. 结语

汉语四阶连续体普通话、地方普通话、趋普方言与方言和而不同地共存于当代中国社会。地方普通话是以普通话为目标语的中介语,趋普方言是因普通话的优势作用而出现的异化方言。在普通话与方言的高频接触中,经异源性变异(结构互协、母语浸染)和自源性变异,标准普通话音系被改造,形成地方普通话。在方言与普通话的高频接触中,经蚕食性变异与虹吸式变异,方言本体音系被改造,形成新的趋普方言音系。

参考文献

- 鲍明炜 1980 《六十年来南京方音向普通话靠拢情况的考察》,《中国语文》第4期。
- 鲍明炜 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测试培训中心(编制) 2004 《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商务印书馆。
- 李荣(主编) 200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刘丹青 1995 《南京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刘俐李 2003 《苏州铁路窗口用语的吴语变异》,《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俐李 2012 《江淮方言入声时长变异实验研究》,《中国语言学》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俐李等 2007 《江淮方言声调实验研究与折度分析》,巴蜀书社。
- 南京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小组 1961 《南京方音中几个问题的调查》,《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八本)》,文字改革出版社。
- 邵荣芬 1979 《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
- 侍建国 2014 《“汉民族语言‘和而不同’”》,《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18日第B03版。
- 宋益丹 2009 《南京方言中的人声喉塞尾实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2期。
- 汪莹 2014 《南京方言语音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 袁家骅 1983 《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 詹伯慧 1981 《现代汉语方言》(第1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 赵元任 1929 《南京音系》,《科学》第13卷第8期。
- 赵元任 2002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刘俐李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liulili-nj@163.com;
唐志强 合肥 安徽大学文学院 774564456@qq.com